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17

“代理人媒体”：东盟金边六国媒体涉华国际冲突报道的消息来源偏向研究

李康龙¹

(广西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 在国际新闻报道中, 各社会行为主体以消息来源的身份介入新闻生产进而获得参与真实建构、界定社会真实的权力, 与新闻媒体形成复杂权力关系。本研究从“选择”和“重组”两大偏向考察东盟媒体涉华国际冲突报道的消息来源偏向, 揭示被隐藏于幕后的权力实践。通过对相关报道的消息来源实证分析显示, 东盟金边六国主流媒体在通过“选择偏向”广泛引用中菲两国政府官方声音的同时, 主要借助“重组偏向”将中国声音和菲律宾声音分别置于观点相对立和相一致的消息来源网络之中, 达到消解中国话语权、强化菲律宾声音的传播效果。研究有助于揭示东盟媒体与消息来源的权力互动实践, 启示我们在推进我国国际传播时关注“重组”机制。研究在样本数量和议题类型层面具有局限性, 未来可综合考察近年来多起冲突事件的新闻报道, 或将研究视野拓展至其他议题新闻背后的消息来源互动关系。

关键词: 东盟媒体 国际冲突报道 消息来源偏向 社会网络分析

一、前言

作为新闻来源的各行为主体拥有独属的议程, 掌握着向公众公开或者隐藏某些信息的垄断权力。新闻来源向媒体提供的有价值的、可验证的和无成本的信息, 以换取积极的回报, 因而有学者将其称之为“信息补贴”^[1]。在这种新闻生产的路径中, 新闻媒体成为了信息的被动传递者。虽然媒体具有消息来源的选择控制权, 但如果记者不断地以对消息来源不利的方式报道新闻, 消息来源也会倾向于停止传递信息。为了促使消息来源披露信息, 记者有动机对消息来源的观点做出积极的解释^[2]。Berkowitz 将这种互动关系描述为一场“拉锯战”, 认为新闻来源试图在“管理”记者的同时, 希望呈现对自身有利的信息^[3]。因此, 新闻来源能够有效影响媒体的新闻报道, 媒体可能会故意向公众提供有偏见的信息, 成为其“代理人”。换言之, 基于特定来源的信息可能构成某种偏见。

循此逻辑, 新闻报道中的消息来源使用偏向作为媒体与各类消息来源(行为主体)之间权力互动的结果, 可以成为我们观察媒体建构中权力关系的一个窗口。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强化和南海争端频发的双重背景下, 考察东盟各国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的消息来源偏向, 可以反映出其国际新闻生产的复杂权力关系。此外, 国际新闻作为一国政治立场的风向标, 分析其信息来源偏向也能窥见各国在“中国-东盟”议题的观点和态度。

已有的消息来源偏向研究关注大众传播领域中, 大众媒体重视哪些行为主体的信息, 忽视哪些行为主体的信息, 涉及一国之内的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 少从国际新闻权力斗争的视角探究消息来源偏向。本研究选取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六国主流媒体中涉及中菲“激光冲突”事件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样本, 从“选择”和“重组”两个维度来探究东盟媒体在涉华国际冲突报道中的消息来源偏向。该六国是东盟中的主要国家, 被称为“金边六国”, 人口多、经济体量大, 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更为密切, 更加关注涉华国际事件。而国际冲突事件牵涉多国权益纠纷, 吸引全球媒体的关注, 相关报道涉及不同意识形态的象征场域, 其消息来源偏向更能折射国际权力斗争实践。

[作者简介]

李康龙(2001—), 男, 湖南郴州人, 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 消息来源偏向：新闻媒体的“选择”机制和“重组”机制

权力互动视角下的消息来源研究认为，各类行为主体会策略性地接近媒体，以消息来源的身份参与话语权争夺和真实建构；媒体亦会策略性地使用消息来源以维护或挑战既有权力结构^[4]。新闻媒体通过赋予消息来源建构持续意义的能力与其互动，对社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选择”和“重组”是媒体与消息来源进行意义互动和权力实践的两大机制^[5]。选择机制是指新闻媒体依据新闻框架对社会真实进行选取和排除。在各个消息来源的权力互动中，新闻媒体会在考虑自身收益的前提下，对来源主体及其提供的信息进行筛选。重组机制，即媒体通过对信息内容的组合方式和时空转换，强调和再现部分真实，产生对社会行动的控制力。

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是记者从哪些来源获取信息，着眼于消息来源的选择机制，其研究问题多为各类消息来源是否以及在多大比重上被新闻报道采用。该取向研究认为，消息来源使用偏向是新闻生产过程中媒体（记者）基于自身利益和价值判断而做出的主动选择。比如，媒体为节约新闻生产成本，会倾向使用易接触、专业性、权威性的消息来源^[6]；记者为增加社会资本，会倾向使用官方机构和社会名流作为消息来源^[7]；媒体为掩盖其垄断新闻的意图，会有计划地寻找制式批判者作为消息来源^[8]。因此有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是“权力中心的人”在消息来源中占主导地位。L.V.Sigal 调查美国华盛顿地区新闻记者与消息来源互动的情况，发现政府官员占消息来源的四分之三，是在新闻报道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权力主体^[9]。而在 Twitter 等社交媒体中，也有实证研究发现新闻媒体没有充分利用社交网络的民主潜力，偏向于使用精英消息来源^[10]。在我国，政府官方一直是中国报纸新闻的最主要消息来源，且各类公关主体在与新闻媒体互动时存在明显的选择性和策略性^[11]。

而学界较少关注新闻媒体对新闻来源的重组机制，忽视被选择的主体以何种形式被重新组合、呈现。对“选择”偏向的强调，容易片面地认为“被选择得越多，影响力就越大”。但现实是，新闻媒体并不会公平对待所有新闻来源：有的是以积极的状态被呈现在新闻报道中的，而另一些却是以消极的状态呈现的，这些被积极呈现的消息来源显然具有（或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12]。因此以引用数多少这一单一维度来考察消息来源偏向，实际上将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主体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简单化，其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也恐存在主观偏见、论证不足等问题。

既然媒体可以借助“选择”和“重组”两种机制完成其权力实践，对消息来源使用偏向的考察就不仅应该关注消息来源在多大程度上被选择的问题，而且应该重视消息来源以何种方式被重组的问题。因此，本研究从“选择”和“重组”两个维度考察东盟涉华国际冲突报道的消息来源偏向，以期更全面地揭示消息来源使用偏向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

(二) 东盟媒体研究：海外华文媒体和“他塑”的中国国家形象

相对于欧美国家的媒体研究，东盟国家媒体一直被国内学界所忽视。相关研究论文的数量与“中国-东盟”的双边关系发展紧密相关。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其中东盟各国也成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伙伴，此后的相关研究论文稳定增长。到2020年，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发文量也达到历年顶峰^[13]。

有关东盟媒体的研究，国内学界多关注于东盟华文媒体。刘晋、蔡昌卓分析印度尼西亚媒体《国际日报》的报道框架，探究印尼华文媒体在传递“丝路之声”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14]。聂浩采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对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关于“一带一路”的新闻报道进行研究和分析^[15]。周思敏、俞皎岛对联合早报网关于人工智能的新闻报道进行框架分析^[16]。陈莹从媒体定位、内容、副刊、管理等方面分析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生存策略^[17]。此外，东盟华文媒体研究还大量见于硕士毕业论文。

国家形象是被大众媒介所制作的高度政治化的新闻幻觉^[18]，具有社会建构特征。学者们对于东盟媒体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及其建构方式也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东盟国家民众对于中国形象存在刻板印象，探析“他塑”形象的客观面貌具有必要性^[19]。张昆、陈雅莉采用框架分析和质化内容分析法，考察两份东盟英文报纸报道南海争端过程中的主导性框架、意见话语和对华态度，发现中国在东盟媒体上所建立的“友善的大象”的形象，随着南海争端的风波再起而逐渐裂变为“进击的巨人”^[20]。罗奕通过对东盟六国大众媒体的涉华报道进行舆情监测，发现目前在东盟国家中，中国已经树立“成功的经济形象”，但“政治形象”和“国民形象”偏负面^[21]。

综合考察东盟媒体研究的相关文献，发现存在一下三点不足之处：一是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以东盟华文

媒体为研究对象；二是多数研究通过框架分析的视角探究媒体的报道框架，研究问题多囿于“呈现出什么框架”“展现出什么形象”；此外，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一带一路”“中国加入 RCEP”、人工智能等经济、科技、文化等重大事件，忽视了涉华国际冲突事件的特点和影响。

（三）研究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东盟媒体与消息来源的互动关系研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相关研究比较少，实证研究尚属空白。此外国际冲突议题涉及国家间激烈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斗争，由此成为各国行为主体争夺话语权的重要场域。而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受制于客观条件限制，媒体会更加依赖于消息来源，后者也由此可以获取更大的权力，甚至决定对新闻事件的定义和评价^[22]。因此，研究东盟各国主流媒体的涉华国际冲突报道的消息来源偏向问题，早已超出国家地理限制而延伸至国际权力空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权力关系的绝佳案例。具体通过消息来源使用度与网络密度、节点中心度、边权重考察“选择”维度和“重组”维度。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讨论以下问题：

RQ1：在中国与东盟“合作-斗争”双重背景下，东盟主流媒体涉华国际冲突报道的消息来源卷入度情况如何？

RQ2：东盟主流媒体涉华国际冲突报道存在怎样的消息来源选择偏向和重组偏向？

RQ3：各国媒体报道中的消息来源使用偏向折射出怎样的权力关系？

三、研究设计：样本收集与编码

（一）样本选择

本研究选取金边六国中具有主要影响力的新闻媒体中涉及中菲“激光冲突”的新闻报道作为样本，包括印尼《雅加达邮报》、泰国《曼谷邮报》、新加坡《海峡时报》、越南通讯社、《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主要从 Lexis-Nexis 媒体数据库获取。

2023年2月6日，菲方一艘海警船未经中方允许，擅自闯入仁爱礁邻近海域，中国海警船对其进行喊话警告，使用手持激光测速仪和手持绿光指示笔，测量菲方船只距离和航速，并指示船只方位和航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声称，中国海警船向菲方一艘船只发射激光。该事件发生后引发东盟各国媒体的争相报道，时至本文写作的10月31日，也尚未有一个明确解决。鉴于此，本研究将检索时间设置为2023年2月6日至2023年10月31日，以“China”“Chinese”“Philippine”“laser”等为关键词，检索出涉及中菲“激光争端”时间的新闻报道，经过人工清洗和整理，最后获得有效样本277篇。

（二）类目建构

1.消息来源类型。已有研究对消息来源的类目建构主要基于其身份类型（比如政府、企业、普通公众等），为深入揭示不同国家行为主体间的权力差异，本研究引入国别维度，并在对小样本进行前期分析的基础上，将消息来源按照国别、身份两个维度划分为3*4共12个类目。其中从国别维度划分，包括：中国、菲律宾、他国（即第三方国家）；从身份维度划分，包括政府、军队、媒体、智库。

2.消息来源使用度。消息来源使用度用以考察消息来源在多大程度上被媒体选择和使用，参照陈先红、陈欧阳的研究将其操作化为“使用广度”和“使用密度”。使用广度用以衡量媒体在多大比重的新闻中选择某一消息来源，计算方法为：某一消息来源使用广度=使用该消息来源的新闻篇数/总新闻篇数；使用密度用以衡量某一消息来源在其覆盖的每篇新闻中被使用的平均次数，计算方法为：某一消息来源的使用密度=使用该消息来源的总次数/使用该消息来源的新闻篇数。例如，在50篇新闻中，有15篇使用了某个消息来源，则该消息来源的使用广度为30%；该消息来源在三篇新闻中分别出现了1次、2次、3次，则该消息来源的使用密度为 $(1+2+3)/3=2$ 。使用广度越大表示该消息来源被越多的新闻采用，使用密度越大表示该消息来源在被采用的报道中发出的声音越大。

3.消息来源重组关系。消息来源重组关系即考察消息来源在新闻报道中是被如何重组呈现的。借鉴陈欧阳、蒋国亚的研究，本研究按照重组关系的性质将其操作化为“扩大型”和“消解型”两种类型：扩大型即媒体在使用某一消息来源时将其与观点、立场、态度相近的其他消息来源组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对其声音和权力的放大；消解型即媒体在使用某一消息来源时将其与观点、立场、态度相反的其他消息来源组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对其声音和权力的消解。编码时，对同时出现在一篇报道中的几个消息来源的引述内容进行两两之间的比较，如果两者态度一致，则这两个消息来源之间的关系标为“+”（扩大），反之，则标为“-”（消解）。比如：一篇报道中同时使用了中国政府、菲律宾政府、他国军队三个消息来源，其中中国政府和他国军队

的立场相近，与菲律宾政府的立场相反，则中国政府与外国军队之间的关系标为“+”，中国政府与菲律宾政府之间的关系标为“-”，外国军队与菲律宾政府之间的关系标为“-”。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内容分析能够实现对报道中消息来源使用情况的量化统计，社会网络分析则有助于直观地揭示消息来源之间的重组关系。

在操作步骤上，本研究先随机抽取 30% 的样本让两位培训过的编码员进行预编码，消息来源类型、消息来源重组关系两个变量的编码员间信度 Krippendorff's alpha 为 0.84 和 0.83，符合基本要求^[23]；对有争议编码进一步讨论直至达成共识后，编码员进行正式编码。完成编码后，进行消息来源使用广度及使用密度的计算，以及同一篇报道中消息来源两两之间重组关系的统计；并根据消息来源重组关系的性质（扩大、消解）构建 12×12 一模无向邻接矩阵，然后导入 Gephi 软件生成消息来源重组关系的网络图。网络图中的节点代表消息来源类型，节点越大表示该节点的点度中心度越大，即该消息来源与其他消息来源共现频率越高；两个节点间连线越粗表示这两个消息来源共现频率越高，边权重越大；边颜色“红色”意为两个消息来源是相互支持的强化扩大型关系，“蓝色”则表示两个消息来源是相互对立的消解型关系。

四、研究发现

（一）选择维度：“菲强中弱”的话语结构

从使用广度维度来看，菲律宾（90.90%）是东盟媒体采用最为广泛的消息来源（图 1），大大高于中国（66.23%）和外国（64.93%）。具体来看（图 2），来自菲律宾政府的信息是在东盟主流媒体关于中菲“激光冲突”的报道中出镜率最高（72.73%），远高于中国政府（44.16%）。此外，菲律宾军队（35.06%）、菲律宾媒体（2.60%）、菲律宾智库（5.19%）的使用广度也分别高于中国军队（18.18%）、中国媒体（1.30%）和中国智库（2.60%）。值得注意的是，东盟主流媒体还注重发出外国政府（28.57%）的声音。

而依据使用密度维度，相对于中国（1.57）和外国（1.6），菲律宾（2.23）也是发出声音最大的消息来源（图 2）。进一步分析，外国政府（2.00）和中国智库（2.00）虽然居于首位，但因为中国智库作为消息来源只出现在 2.60% 的新闻报道中，并没有被东盟主流广泛采用，所以不是重要信源。而菲律宾政府作为分布最广泛的消息来源，也具有较高的使用密度（1.87）。而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再次展现出话语弱势，其使用密度为 1.67，与菲律宾军队（1.66）不相上下，外国军队则略低（1.6）。其余各类消息来源的使用密度则不足 1.2。

综合以上两个维度，发现来自菲律宾（90.90%，2.23）的消息来源是东盟主流媒体关于中菲“激光冲突”事件的相关报道中出镜率最高、声音最大的消息来源，其使用广度和使用密度均位居首位。而作为当事国之一的中国（66.23%，1.57）却尽显话语弱势，在使用广度上略高于外国（64.93%，1.6），但使用密度相对更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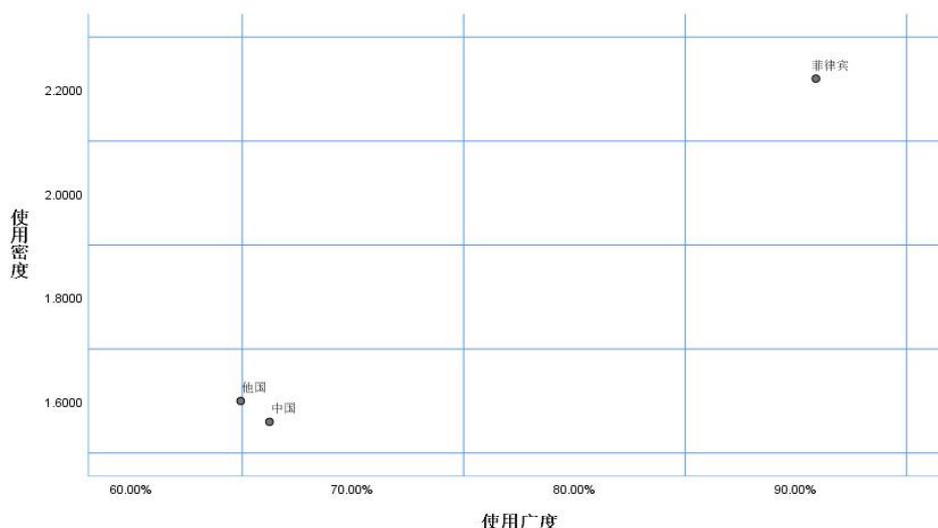


图 1 东盟主流媒体各国别消息来源使用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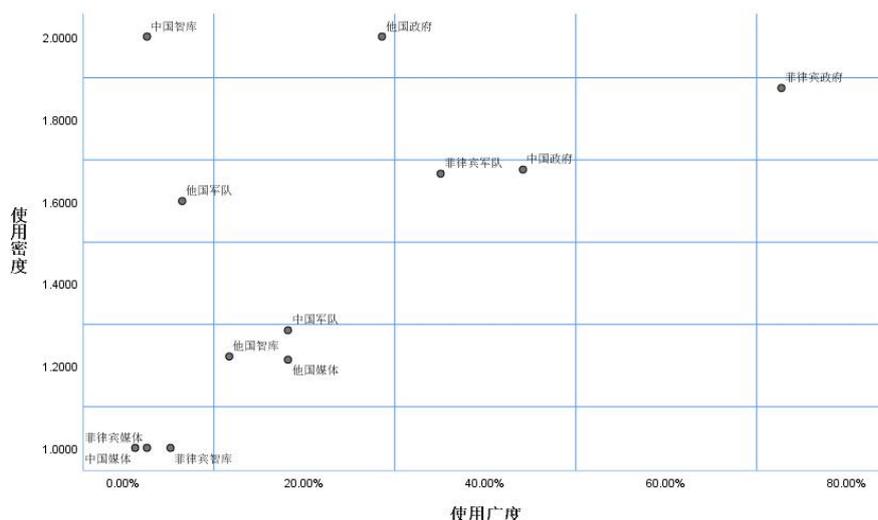


图2 东盟主流媒体消息来源使用度

(二) 重组维度：平衡中立的来源幻象

本研究首先引入密度 (density) 这一指标来描述消息来源重组网络中各个节点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 密度呈现出网络节点之间的联结程度, 取值范围介于 0-1 之间。数值达到 0.5 以上, 便可被视为中高等网络密度。密度越高, 消息来源重组网络的完备性程度越高, 信息流动现象越显著, 整体重组网络对媒体提供资源影响的可能性越大^[24]。通过使用 Gephi 软件对六家媒体的重组关系数据进行计算, 结果为 0.742, 说明六家东盟主流媒体的中菲“激光争端”新闻报道的消息来源重组关系网络属于中高等密度网络, 具有较高的完备性。

中心性 (centrality) 是社会化网络重要的结构属性, 包括点度中心性 (degree centrality)、中间中心性 (betweenness centrality)、接近中心性 (closeness centrality) 等多种度量方式 (Borgatti, 2005), 能够描述个体行动者在网络中的权利位置^[25]。本研究无意探究节点的桥梁作用和流通方向, 因此只引入点度中心度这一指标用以考察各个消息来源在重组关系网络中的权利位置, 同时以两个消息来源的共现频率作为边权重。

点度中心度最高的节点是菲律宾政府 (点度中心度 159), 与其共现频率最高、连接最为紧密的三个节点为中国政府 (边权重 59)、菲律宾军队 (边权重 40) 和他国政府 (边权重 25), 其中前者与菲律宾政府之间的连线为蓝色, 后两者与菲律宾之间的连线基本为红色, 总边权重为 65, 说明六家东盟主流媒体倾向将菲律宾政府与中国政府、菲律宾军队和他国政府组合在一起, 以相互支持的观点强化菲律宾政府的声音,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中国政府官方的“消音” (图 3)。

例如新加坡《海峡时报》在一篇报道中援引菲律宾政府的观点“中国对马尼拉的一艘船使用军用级激光是‘侵略性行为’”, 美国政府“我们将与菲律宾开展的军演是为了面临中国威胁”以及菲律宾军队“将继续根据我国宪法和国际法维护我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共同消解中国政府官方话语“2月6日中国对菲律宾船只使用激光是合法的”。

虽然中国政府的点度中心度为 149, 居于第二位, 并没有与菲律宾政府相差过大, 东盟主流媒体看似给予了事件当事双方充分的话语表达权力。但事实上, 与中国政府共现频率最高、连接最为紧密的三个节点为菲律宾政府 (边权重 59)、菲律宾军队 (边权重 27) 和他国政府 (边权重 25), 与其他节点的边权重则不超过 10。同时, 中国政府与前两者的连线为蓝色, 与他国政府的连线以蓝色为主、红色为辅。这说明六家东盟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政府的声言时, 通常会组合引用与其观点相悖的菲律宾政府、军队以及他国政府的信息, 实现对中国政府的话语的“此消彼长”式压制, 从而消解中国政府的声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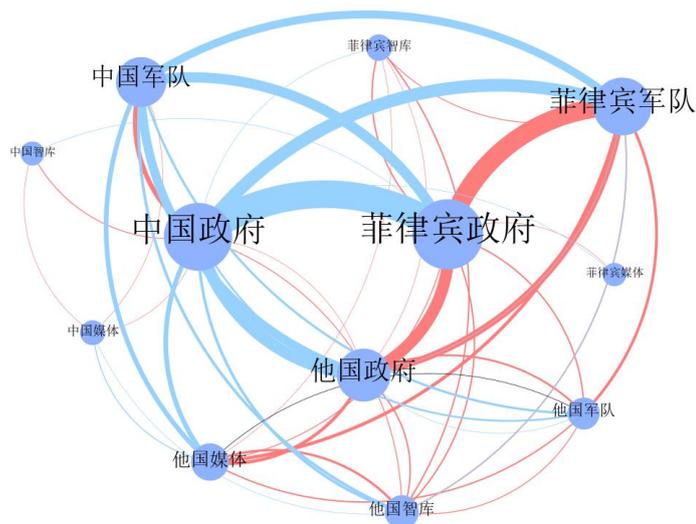


图3 东盟主流媒体消息来源重组关系网络

五、 结论与讨论

传统的东盟媒体研究聚焦于华文媒体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研究对象多为涉华报道框架，虽然会涉及到“消息来源”这一指标，但多限于“选择偏向”，同时也少涉及南海冲突事件，研究视角存在单一化的趋势。本文强调从消息来源的“选择”和“重组”两大偏向进行全面考察，对六家东盟主流媒体关于中菲“激光冲突”报道中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声音在该事件的报道中被广泛引用，已成为难以使用选择机制直接排除的重要消息来源。但六家媒体通过“重组”机制组合多种对立声音以达到消解中国声音的传播效果。这一发现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在理论层面，揭示了“被遮蔽”的东盟主流媒体与多元消息来源主体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一方面，选择机制是东盟主流媒体参与权力实践的重要机制，可以通过对消息来源的选择或排除，赋予或剥夺消息来源参与真实建构的权力。本研究数据显示，在六家东盟主流媒体关于“激光争端”的报道中，中国政府官方的声音是使用广度和使用密度最高的消息来源之一，似乎被给予了充分的话语空间，广泛参与社会真实的认知建构。另一方面，东盟主流媒体虽然选择报道中国声音，但借助重组机制将中国官方声音至于相对立的多个消息来源的“围墙”之中，将菲律宾官方声音簇拥于持有相似或相同立场的来源主体的网络之中，建构了“菲强中弱”的话语权结构。因此通过综合考察“选择”和“重组”两大权力实践机制，发现东盟主流媒体营造出“平衡中立”的假象，隐藏其权力控制的意图，这有助于揭示在南海议题国际新闻生产中更为隐蔽的权力实践。

在实践层面，近年来大量的东盟媒体研究发现，在东盟十国的各主流媒体上出现的中国声音越来越多，关注度和引用率进一步提高，他塑的中国形象也日趋向好^[26-29]。但是我们在为“报道量”“引用率”大幅提高感到鼓舞时，必须要认识到“声音越来越多”不代表“形象越来越好”。伴随着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往来愈加紧密、区域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已成为东盟国家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难以直接借助“选择”机制排除中国声音。但六家东盟主流媒体虽然给予中菲两国政府相近的出境率，但却通过不同的组合策略实现了对菲律宾声音的扩大和对中国声音的消解。这一发现启示我们，中国改善在东盟国家之中的国家形象认知、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实践，不能囿于引用率、报道量等指标，而应进一步考察媒体重组实践方式。

本研究还具有下述局限。第一，研究只以中菲“激光冲突”事件为例，恐存在样本量较少的问题。进一步研究可以全面选取近年来的南海冲突事件，如中菲黄岩岛冲突事件、中菲仁爱礁冲突事件等为例，增强研究样本全面性和代表性。第二，研究聚焦于国际冲突事件这一特殊国际新闻类别，缺少对经济、文化、社会、体育等其他议题的涉华新闻报道中东盟媒体与消息来源的互动关系的考察，未来或可从议题类型层面进行视野拓展。

参考文献：

- [1]Gandy O H. Beyond agenda setting: Information subsidies and public policy[J]. (No Title), 1982.
- [2]Dyck A, Zingales L. The media and asset prices[R]. Working Paper,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3.
- [3]Berkowitz D, TerKeurst J V. Community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y: rethinking the journalist-source

-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9, 49(3): 125-136.
- [4]陈欧阳,蒋国亚.“被选择”不等于“被接受”: 外媒涉华经济报道中消息来源使用的双重偏向[J]. *新闻界*,2022,(11):77-88.
- [5]臧國仁. 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 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M]. 三民书局, 1999.
- [6]Rains S A, Ruppel E K. Channel complementarity theory and the health information-seeking process: further investigating the implications of source characteristic complementarity[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6, 43(2): 232-252.
- [7]Broersma M, Den Herder B, Schohaus B. A question of power: The changing dynamics between journalists and sources[J]. *Journalism Practice*, 2013, 7(4): 388-395.
- [8]Garcia-Pires A J, Kind H J, Sjørgard L.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news sources on media coverage[J].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2017, 41: 28-35.
- [9]Sigal L V. Bureaucratic objectives and tactical uses of the pres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73: 336-345.
- [10]Hladík R, Štětka V. The powers that tweet: Social media as news sources in the Czech Republic[J]. *Journalism studies*, 2017, 18(2): 154-174.
- [11]陈先红,陈欧阳. 公关如何影响新闻报道:2001-2010 年中国大陆报纸消息来源卷入度分析[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34(12):36-41.
- [12]Cottle S, Nolan D. GLOBAL HUMANITARIANISM AND THE CHANGING AID-MEDIA FIELD: “Everyone was dying for footage”[J]. *Journalism Studies*, 2007, 8(6): 862-878.
- [13]黄诗仪. 国内东盟媒体研究的知识经验与趋势分析——基于 CiteSpace 知识图谱可视化研究 (2002-2022) [J]. 采写编,2023,(09):136-138.
- [14]刘晋,蔡昌卓. 印度尼西亚华文媒体的“一带一路”报道研究——以《国际日报》为例[J]. *传媒*,2020,(22):50-52.
- [15]聂浩. 马来西亚华文媒体中的“一带一路”倡议——基于对《星洲日报》相关新闻报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J]. *青年记者*,2019,(30):47-49.
- [16]周思敏,俞皎岛. 海外华文媒体对人工智能的报道框架分析——以联合早报网与欧洲时报网为例[J]. *青年记者*,2018,(33):95-96.
- [17]陈莹.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生存策略[J]. *青年记者*,2013,(17):87-88.
- [18]董小英,李其,师曾志,等. 奥运会与国家形象: 国外媒体对四个奥运举办城市的报道主题分析[J]. *中国软科学*,2005,(02):1-9.
- [19]张美云,杜振吉. 基于媒体计算的中国形象“他塑”模型建构——以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为例[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7(06):150-157. DOI:10.15886/j.cnki.hnus.2019.06.020.
- [20]张昆,陈雅莉. 东盟英文报章在地缘政治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建构——以《海峡时报》和《雅加达邮报》报道南海争端为例[J]. *新闻大学*,2014,(02):72-82. DOI:10.20050/j.cnki.xwdx.2014.02.012.
- [21]罗奕. 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基于东盟国家大众媒体涉华报道的舆情分析[J]. *传媒*,2019,(14):79-82.
- [22]Seib P M. The global journalist: News and conscience in a world of conflict[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 [23]Krippendorff K. Content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M]. Sage publications, 2018.
- [24]Kang S M. Equicentrality and network centralization: a micro-macro linkage[J]. *Social Networks*, 2007, 29(4): 585-601.
- [25]Freeman L C. Centrality in social networks: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J]. *Social network: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Londres: Routledge, 2002, 1(3): 238-263.
- [26]王祖嫫. 中文国际传播与中国形象认知的相关性研究——来自东南亚五国的实证[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4(03):66-77.
- [27]孙梦诗,张瑛,张祎彤. 东盟主流媒体报道中的中国经济形象研究——以中国加入 RCEP 相关报道为例[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9(03):158-168.
- [28]罗奕,梁媛. 泰国华文媒体构建“中国形象”认同研究——以泰国《星暹日报》和《世界日报》微信公众号新闻推送为例[J]. *传媒*,2016,(24):57-59.
- [29]申雪凤. 海外华文媒体对“真实中国”形象塑造的作用——以联合早报网《读者调查》栏目为例[J]. *传媒*,2016,(01):78-81.

"Agent Media": A Study on Source Bias in China-Relate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Coverage by Media of Six ASEAN Countries

Li Kangl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China

Abstract: In international news reporting, various social actors participate in news production as information sources, thereby acquiring power to construct reality and define social truths through complex power relations with medi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source bias in ASEAN media's coverage of China-related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through the dual lenses of "selection bias" and "restructuring bias," revealing hidden power practices. Empirical analysis of news sources demonstrates that mainstream media in six ASEAN countries based predominantly cite official voices from both Chinese and Philippine governments via "selection bias," while employing "restructuring bias" to position Chinese and Philippine sources within opposing or aligned narrative networks. This dual mechanism diminishes China's discursive influence while amplifying Philippine perspectives. The study advances understanding of power interactions between ASEAN media and sources, highlighting the need to prioritize "restructuring mechanisms" in China's glob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Limitations include sample size constraints and narrow issue focu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pand to multi-conflict analyses across diverse geopolitical contexts or extend to source interactions in non-conflict news.

Keywords: ASEAN media international conflict reporting source bia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